

对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理论性质的总体性审视

卜祥记 朱利兵

摘要 基于马克思辩证法对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理论性质的审视,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路径。知性反思的观点执著于外在性与碎片化的对比分析,致力于探寻马克思辩证法与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相似处和相悖点,并据此呈现阿多诺“否定辩证法”思想的理论贡献和理论局限,在这种研究路径中,阿多诺辩证法的总体性质却消失不见了。只有从辩证法的总体性观点出发,直面阿多诺面置身其中的垄断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情况以及由此生成的阿多诺的理论总问题,才能恰当地看待“否定辩证法”的理论贡献、理论局限及其内在关联,才能把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看作一个完整的理论总体,并据此呈现其总体性质。这时我们就会发现,通常理解的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局限性也许恰恰就是它的思想创新之所在。

关键词 阿多诺;“否定辩证法”;审美救赎;革命话语;革命辩证法;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 B51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2)01-0027-1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BZX006);上海财经大学创新基金资助项目(CXJJ-2020-370)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领袖之一,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几乎对历史上的一切辩证法形态都进行了批判和解构,在辩证法理论谱系的历史演进中占有重要的理论地位,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尽管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对阿多诺已经做了多方面的深入研究,但立足于马克思革命性辩证法的理论视域,再度反思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问题域、思想贡献及其理论局限,对我们更深刻全面地理解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革命性意蕴及其当代价值,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在与马克思革命性辩证法的对比性视域中,在与马克思提供的破解资本主义难题的辩证法思想方案的对比中,我们才能准确界定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理论局限和症结;只有深入理解阿多诺在传统辩证法的思想体系中发现了什么问题以及他是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而且这些问题的解决究竟具有何种意义上的当代性指向,我们才能本质性地确定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思想价值。

一、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理论贡献

在马克思辩证法视域下,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在理论前提、理论主题、理论逻辑、理论倾向和理论结局等方面,都与马克思的革命辩证法有相异甚至相悖之处。但是,如果我们充分理解阿多诺辩证法思想的时代感、现实感以及由之而确定的批判性指向及其理论使命,就不难发现,阿多诺与马克思在许多方面具有深刻的内在关联,而且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也做出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并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理论贡献,这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积极意义。

(一)同一性批判:从哲学的高度上终结了理性形而上学

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哲学高举理性的大旗开启了对以神秘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社会思潮的理性反思

和批判^①,理性成为人们推崇和追求的对象。历史地看,理性启蒙运动的确对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但同时也逐步走向对理性的过度崇拜。对此,阿多诺并不讳言——“启蒙精神摧毁了旧的不平等的、不正确的东西,直接的统治权,但同时又在普遍的联系中,在一些存在的东西与另外一些存在的東西的关系中,使这种统治永恒化”^[1](P10)。因此,对理性启蒙的再反思就成为历史的必然。在与霍克海默共同发表的《启蒙辩证法》中,阿多诺重新开始冷静地思考被西方世界奉为指路明灯的启蒙理性,开启了批判启蒙理性的先河,终结了启蒙理性的神话。这一颠覆人的想象和具有开创性的工作可以看作哲学史上的一次思想革命。对此,哈贝马斯曾经指出:“阿多尔诺在哲学史上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唯有他严谨地阐明、并彻底解决了把总体宣布为虚构的启蒙辩证法的理论结构的难题。从坚持批判的意义上来说,他是我所认识的一位最系统、最彻底的思想家。”^[2](P72)哈贝马斯的这一高度评价指明了阿多诺对哲学史的贡献在于提出并回答了理性本身具有辩证性质的课题或难题。作为《启蒙辩证法》思想的延续和深入推进,《否定辩证法》是对启蒙理性的同一性哲学本质的揭示,是从哲学高度对理性同一性本质的终结。所谓启蒙理性的同一性是就启蒙理性之演变为思辨理性的本质而言的,指的是启蒙理性借以突破神秘主义的理性武器不过是“世界归一”的理性,而这个“一”或理性只能是在思维中预设的虚幻的假象,是伪谬的或不真实的。对启蒙理性来说,“同一性表象是思维本身所固有的。思维意味着同一化”^[3](P6)。在《否定辩证法》中,阿多诺形象地把其称为“形而上学的西洋镜”^[4](P207)。在阿多诺看来,现代哲学家尼采的权力意志和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在本质上也归属于同一性思维。从启蒙辩证法到否定辩证法的理论演进,在一定程度上试图根本颠覆自古希腊以来直至近现代哲学中相继占据主导地位的第一哲学或同一性思维,因而可以看作继马克思之后在辩证法历史上发动的又一场针对思辨理性哲学的批判运动,也使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进一步上升到辩证法的高度,并因之而具有浓重的哲学色彩。由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思辨理性哲学的批判直接从对启蒙理性的反思开始,或者说,他们开启了启蒙理性批判之先河,因此在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地位。

黑格尔之后的许多思想家都曾经对以黑格尔理性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进行了猛烈攻击和批判。但是,阿多诺认为他们对理性哲学的批判和否定都是不彻底的,并没有从哲学根基上实现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摧毁和解构,甚至有的哲学家在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同时又重回形而上学的窠臼。面对现代哲学无法摆脱传统形而上学的困境,阿多诺认为必须深入呈现理性形而上学的同一性本质,而这本质源于启蒙理性本身再度成为作为幻象的绝对理性预设,从而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用绝对的、彻底的否定逻辑来反对一切形而上学。就此而言,阿多诺是继马克思之后在反传统形而上学的道路上表现得最坚决、最彻底的思想家之一。在这个意义上,阿多诺可以被看作形而上学的终结者。

作为理性启蒙运动之高端发展形式的理性形而上学关注的是抽象的思维活动和思维形式本身,它将人的现实生活内容抛出辩证法之外。“传统思维的错误在于,它将同一性视为自己的目标。”^[3](P170)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则以“非同一性”为理论前提,试图将辩证法从思辨的概念体系中拯救出来,因而更接近现实生活世界的辩证法。当代辩证法的发展趋势显然承继了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核心要义,它以反对同一性、形而上学和体系为主线,关注事物的特殊性和个别性,是一种更趋向于开放性、多元性的辩证法。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辩证法从来不是一个封闭的体系,它本身就具有开放的性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需要吸收包括西方现当代哲学在内的一切人类文化的积极成果。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个杰出代表,阿多诺对启蒙辩证法的反思和批判对我们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学术性革命内涵及其通达现实生活的直接现实性品格,克服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形式主义诠释和外在性应用的弊端,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的时代化、现实化和中国化,立足鲜活的当代社会生活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时代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辩证法话语体系,具有重要的启迪

① 对于启蒙的宗旨,阿多诺自己曾经谈到“启蒙想消除神话,用知识替代想象”^[1](P1)。

和借鉴意义。

(二)文化批判: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延伸和拓展

如果说马克思革命性辩证法的现实性品格集中体现在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阿多诺否定性辩证法的革命性则主要体现在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这一文化批判可以被看作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延伸和拓展。马克思开创的革命性辩证法并不是脱离现实生活的抽象辩证法,它是在反思批判自由资本主义的历史合理性、局限性及其走向灭亡的历史必然性的过程中生成的现实辩证法。就此而言,马克思革命辩证法的伟大建构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哲学事件,而是具有深刻现实感的“哲学—政治经济学”双重批判维度的理论事件。或者更准确地说,马克思的革命性辩证法的现实性建构是一个以工人解放即人类解放为旨归、以历史辩证法为前提、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基础的庞大理论工程,是社会批判、哲学批判和经济批判的有机整体。脱离了社会批判的人类解放旨归,马克思的辩证法就失去了灵魂,就会跌落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辩证法;脱离了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反思、批判,马克思的辩证法就失去了它特有的现实性根基,就会变成纯粹的思辨活动和单纯的理论抽象。因此,马克思辩证法的革命性建构不仅是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切入的,而且也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展开和完成的,是哲学的学术性与经济生活的现实性和社会政治生活的无产阶级导向性的科学统一。正是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赋予了马克思革命性辩证法以革命性、学术性、现实性和科学性的伟大品格。直接地看来,不论在批判对象还是在批判路径上,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都与马克思的革命辩证法有巨大的差异。但是,透过这些差异,我们看到的却是由历史进展造成的理论进步。一方面,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是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批判,这一批判对象的变化当然是历史造成的,而顺应历史的诉求,把马克思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批判推进到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批判,应当看作理论的推进或进步。另一方面,阿多诺对垄断资本主义的批判是从文化批判角度切入的,这种视角的转换也是历史造成的,也可以看作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延伸和拓展。

在阿多诺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社会已经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的或成熟的资本主义时代。在阿多诺看来,作为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进展形态,垄断资本从对经济生活的全面统治推进到对社会精神和文化生活的操控,文化商业化和工业化是垄断资本主义统治整个社会的突出特征,文化已变成一种交易,是通过某种工业方式生产出来并等待出售的商品。对文化工业的反思和批判就成为阿多诺“否定性辩证法”的现实指向和理论主题。应当看到,这一批判是基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态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要补充。阿多诺特别关注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自由时间”和人的自由的论述和构想。在《启蒙辩证法》中,阿多诺说道:“晚期资本主义的娱乐是劳动的延伸。人们追求它是为了从机械劳动中解脱出来,养精蓄锐以便再次投入劳动。然而,与此同时,机械化在人的休闲和幸福方面也会产生巨大作用,它能够对消遣商品生产产生巨大的决定作用。”^[5](P123)按照这种构想,在工人的劳动时间日益缩短、自由时间不断增多的情况下,工人的发展就会愈益全面,整个社会就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阿多诺的“闲暇时间”概念的提出直接与马克思的“自由时间”思想相关,二者指称的都是劳动之外可供人自我支配的时间。不过,阿多诺依据成熟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得出了与马克思不同的结论:当资产阶级在工业以及相关产业中获利之后,资本逻辑的触角必然伸向尚未开发的文化领域,结果是文化生活的商品化渗透人们的闲暇生活,在这里发生的是文化的工业化,而文化的工业化则意味着资本主义越出物质生产的边界进而在精神层面实现对所有社会成员的麻痹乃至欺骗。当文化生产变成资本主义工业的一种特殊形式时,也就意味着它必将遵循工业生产的资本逻辑准则。并且,所有文化产品都必然经过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过滤,成为实现资产阶级政治目的的工具。文化产业的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必然后果就是作为社会主体的全部个体逐渐变成没有反思、批判和斗争精神的人,因而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也必然会丧失革命斗志和革命精神。阿多诺洞察到,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自由时间的增多不仅没有带来工人的自由和可能发生的社会进步,反而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对个

为主体的精神统治,这是有重要意义的理论贡献。由此可见,尽管阿多诺与马克思之间存在着反思视角和路径上的差异,但在批判资本主义的根本目标上却存在一致之处。换言之,阿多诺在文化领域对资本主义制度发起的批判与马克思从经济领域切入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只是批判资本主义的视角不同,目标却都一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从这个角度来看,阿多诺的文化批判可以说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延续和拓展,应该被看作阿多诺的理论贡献。

除了对文化工业的宏观批判之外,阿多诺还在微观领域或者针对微观的文化形式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这一批判集中表现在阿多诺对“音乐拜物教”的批判中。这一批判也可以看作是对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的延续和拓展。在阿多诺看来,“音乐拜物教实质上只是其商品性质的一种延迟性的表达。因为所有当代的音乐生活都是被商品形式所统治的……在当今的美国却充当了娱乐的商品”^[6](P37-38)。阿多诺认为,优雅而崇高的音乐在资本逻辑的渗透下已经变成娱乐的商品。根据马克思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理论,当音乐成为某种商品时,它就已经变成了可以赚取利润的产品,音乐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就要大打折扣。阿多诺对“音乐拜物教”的微观批判来源于或受启示于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批判,不同的只是双方切入视角的差异。如果说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是从经济批判中引申出来的文化批判,那么阿多诺的“音乐拜物教”则是从经济批判向文化批判的推进,而且它本质上也隐含着从文化批判再度转向经济批判的理论可能性,即隐含着进而展开的追问“音乐拜物教”生成之现实性根基的经济追问的可能性。从这个意义上看,阿多诺的文化批判也是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一种富有启发性的延续和拓展。

(三) 主客体辩证法:对主体与客体关系问题的新解释

启蒙运动以来西方哲学确立了主体性原则,其目的就是要驱逐神话和上帝,消除人类面对自然的恐惧。康德的“人为自然立法”充分体现了主体第一性原则,自然已经不再是神秘之物,而是需要主体对其立法的客体。但阿多诺试图提醒人们的是,主体第一性的确立并不意味着对自然恐惧的真正消亡,人类想要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其实是对安全的一种渴望,或者说是恐惧的一种逃避。对人类工具理性的征服而言,自然的力量并没有真正消退,它始终对征服它的主体造成反支配和反强制。“随着支配自然的力量一步步地增长,制度支配人的权力也在同步增长。”^[5](P31)随着人对自然征服力的增强,这种工具理性对人的支配力也会愈发强大。阿多诺认为,启蒙及其近代认识论的根本问题在于,它片面地将主体拔高为“第一原则”,同时将自然以及相关的客体降低为第二性之物。在这样一种“主体第一性”的意向中,人试图依靠工具理性认识和把握自然,但这种意向实际上是被抽象出来的,是观念论的产物,是虚幻的、不真实的。“客体只有通过主体才能被思考,但总是作为不同于主体的东西与主体对立;而主体根据自身特征一开始也是客体。即使作为一种观念,也不能设想不是客体的主体,但可以设想不是主体的客体。”^[3](P208)于是,阿多诺把目光转移到客体,并明确指出辩证法是对非同一性客体的关注。他强调,客体相对于主体而言具有优先性,但这种优先性只是一种辩证的优先性,不是“第一性哲学”意义上的绝对优先性。在《主体与客体》中阿多诺说道:“主体一旦完全脱离客体,就把客体纳入自己的规范,主体吞没客体,在很大程度上忘记了它还是客体本身。”^[7](P209)主体和客体的辩证关系始终是相互中介的,即主体以客体为他者既对立又统一,客体以主体为他者也对立又统一,那种不掺杂任何主体的“纯客体”和不掺杂任何客体的“纯主体”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主体与客体既相互区分又相互交往。

阿多诺在如何理解主客体关系的问题上提出了独树一帜的观点。阿多诺认为,现代人是在征服自然的工具理性思维中确立了主体第一性原则,但实际上他们却是在这个社会中被控制的客体,摆脱不了被管理、被驯服和被安排的命运,第一主体即“人”不是变得更强大了,而是变得更为虚弱和没有反抗能力了。但是,人却把自己实际上作为客体的地位错误地看作是主体。据此,阿多诺认为,只有去主体化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主体。尽管阿多诺对主体与客体关系的“相互中介”的理解是在认识论意义上发生的,但他不仅为在认识论的层面上解决近代以来主客体框架的理论难题提供了新的理论思路,而且也在

本体论意义上为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传统主客体框架模式的突破提供了新的启示。在传统的理解中,我们常常把认识论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混同于本体论意义上的主客体关系,并据此阐释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现实关系,从而把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转变成征服自然的工具理性。正是针对这种误解,海德格尔指责马克思的哲学是资本主义“进步强制”所需要的“经济发展与这种发展所需要的架构”^[8](P57,53),甚至有资产阶级学者指出,马克思应该为当下的环境灾难承担理论责任。如何从本体论的理论维度突破主体第一性原则,重启被近代理智形而上学思维遮蔽了的马克思革命辩证法的主客体统一性境域,阿多诺对传统近代西方哲学主客体关系的颠覆性构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具有可借鉴性的理论方案。就此而言,阿多诺的主客体辩证法可以看作辩证法发展史上的一次范式转变,这一转变对后现代思潮具有深远的影响。

(四) 为批判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做出了理论贡献

对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误解和扭曲肇始于斯大林时代。在很长一个时期,《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1938)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被奉为马克思主义正统,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套具有深远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它遮蔽了马克思辩证法的本质性批判性质,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归结为一种僵化、封闭和毫无生机的独断教条。这种教条化的辩证法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的革命性和批判性的辩证法。对此,波普尔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正是由于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所谓的辩证法,马克思的反教条主义态度不见了,辩证法反而变成了强化的教条主义^[9](P476)。这里说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指的就是苏联教科书体系模式下的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上,这种马克思主义已脱变为枯燥和刻板的教条。

在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重新审视中,阿多诺清醒地意识到第二国际理论家伯恩斯坦、普列汉洛夫以及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已经违背了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辩证法。阿多诺认为,“就像观念论辩证法成为文化财富一样,辩证法的非观念论形态却成为教条”^[3](P9)。在阿多诺看来,这种以“非唯心主义形式”呈现出来的辩证法的最主要缺陷和弊端,就在于它把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归结为几条抽象的规律和范畴,遮蔽了马克思辩证法的革命性和批判性本质,把辩证法变成了一种教条和一种凝固的立场,因而只是一种概念辩证法。换言之,当它们致力于彰显马克思辩证法的“非唯心主义形式”时,却一方面丢失或遮蔽了马克思辩证法的活的灵魂,即它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另一方面又把“非唯心主义形式”再度教条化和形式化。据此,阿多诺指出:苏联模式的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也与黑格尔辩证法一样,以建立完整的辩证法体系为己任,它们都属于同一性体系的辩证法。这种封闭的哲学体系束缚和窒息了辩证法的发展,是辩证法发展史上的一个悲剧。阿多诺力图解除这种枷锁,他明确指出自己的“否定的辩证法”是反体系的,而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深受近代体系哲学的影响,其最终目的还是追求同一性。所以,它并没有比黑格尔的辩证法走得更远,仍然是黑格尔辩证法的继承者。要改变这种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误解,就必须对其进行彻底的批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和“否定的辩证法”不仅在批判苏联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上,而且在致力于重启马克思辩证法的批判性内涵和革命性理论维度上,都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尝试和理论贡献。

二、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理论局限性

尽管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在对启蒙运动的再反思及其对马克思辩证法的解读中提供了富有开创性和启发性的见解,但是,立足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性立场、理论境域和理论高度,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它自身在以下四个方面存在的理论局限性。

(一) 思想批判对革命性实践立场的回避

如果说马克思辩证法的本质性品格是革命性的实践,那么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本质向度则是单纯的思想批判。在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中,革命性的实践活动被转变为认识论维度上的对原子个体同一性思维方式的批判。对马克思来说,辩证法从来就不是纯粹的思维形式,而是扎根于现实个人的实

践活动所生成的现实生活世界,对现实生活世界的关注与反思、批判与超越是辩证法的使命担当。因此我们看到,一方面,从对物质利益的困惑到对国民经济学私有财产理论前提的批判,从唯物史观的草创到《资本论》研究,以不同形式呈现出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构成了马克思一生思想发展的理论红线;另一方面,从对黑格尔辩证法之作为劳动辩证法的本质性解读到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式的创立,从作为实践唯物主义哲学范式具象化的唯物史观的草创到据此展开的对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探索,马克思革命辩证法的创建和推进无不植根并服务于作为理论红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服务于无产阶级解放的现实性宗旨,因而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品格。就此而言,马克思的革命辩证法就是实践辩证法。但是,阿多诺的整个“否定辩证法”对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践性品格和现实性立场却始终保持回避态度。面对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统治和思想异化,阿多诺把批判的矛头完全拘泥于对理性形而上学同一性思维方式的反思和批判,并试图通过对全社会原子个体思维方式的改造实现对资本主义的超越,从而再度陷入马克思曾经给予严厉批判并彻底超越了的理论哲学的窠臼。因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本质上依然是一个理论家的费尔巴哈的如下批判也是完全适用于阿多诺的——“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10](P530)。

马克思的革命辩证法的实践性品格集中表现于它以实践唯物主义和唯物史观为理论载体,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现实性场域,以无产阶级革命为实践路径,以人的自由解放为根本宗旨。因此,对市民社会或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成为马克思革命辩证法的核心话语,而且也是这一辩证法之实践性品格的现实呈现形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日本学者城塚登的如下判断是可以接受的:“唯物史观与之全面适应的是处于近代历史阶段的社会,在这一历史阶段,市民社会以赤裸裸的姿态出现,它作为一种独立的力量全面地统治着人”^[11](P119),“唯物史观最典型、最全面地适用于近代的历史。这一点同唯物史观的实践性质深刻地联系在一起”^[11](P120)。与此不同的是,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却刻意回避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践性,忽视了以唯物史观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视角,抛弃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话语,放弃了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过程和经济运行机制的分析和批判,而仅局限于从认识论的视角展开对资本主义的文化批判,从而导致他无法发现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实践动力机制,不能提供超越资本主义的现实可能性方案。

当然,在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理论叙事中也包含对资本主义市场交换原则等经济现象的分析和批判,这些批判不仅是严苛的,甚至还是非常深刻的。但是在阿多诺看来,这些经济现象不过是同一性思维的表征,因而这些富有政治经济学批判色彩的理论成分归根到底依然只具有从属性的意义。直接来说,它意味着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与马克思革命性的实践辩证法在批判资本主义道路上的分道扬镳;间接地但却是本质性地来说,它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经济事实与同一性思维关系的倒置,意味着对同一性思维的无历史性预设和无历史性批判。在这里,资本主义社会背后的生产过程被忽视了,因而理论的关注点也就从实践领域和经济层面退回到思想的领域。这种层面的批判与马克思相比当然缺少深刻性,也就自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阿多诺没有理解,对资本主义社会个体主体进行精神统治的不是同一性的思维方式,而是潜藏于背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是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现实经济活动才导致了同一性的思维方式,而不是这种思维方式凭空统治和支配着现实的个人。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这种纯粹认识论的解读模式中,……阿多诺乃至整个法兰克福学派,貌似对资本主义的方方面面都展开了激烈的进攻,却始终没有在理论上攻克这座资本主义堡垒”^[12](P71)。究其根源,它与阿多诺回避马克思辩证法的实践性品格,从经济批判退回到单纯的文化批判直接相关,也与他作为文化现象的同一性思维的无历史性分析,即与“否定辩证法”的无历史性症结直接相关。它让我们想到海德格尔对萨特的批评:当萨特试图用存在主义人学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所谓人学空场时,海德格尔指出萨特完全没有资格与马克思对话,“因为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而“胡塞尔没有,据我看来萨特也没有在存在中认识到历史事物的本质性”^[13](P383)。在阿多诺看来,当代哲学

的任务就是对资本主义同一性意识形态的批判,并通过这一批判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同一性意识形态对个体主体的精神控制和奴役,至于同一性意识形态的社会经济内涵及其历史性,则是被遮蔽或忽视了。虽然这一批判路向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其就文化而批判文化,离开经济和政治的现实前提而鼓吹纯粹的文化革命,则是头足倒置的,它在本质上还只是一个“批判的武器”而不是“武器的批判”^[10](P11)。只有依托经济批判来展开文化批判,并把文化批判归结于经济批判,“批判的武器”才能变为“武器的批判”。如果说马克思革命辩证法的理论道路是一个从宗教批判走向政治批判,并从政治批判走向经济批判的上升路径,那么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则是一个下降的道路,而缺失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哲学批判,就只能是对现实空洞的、抽象的和没有现实出路的批判。

(二) 审美救赎对解放话语的遮蔽

阿多诺不仅是哲学家,还是颇有影响的美学家,但不是革命家和政治家。这一事实本身不是偶然的,而是由他的哲学精神决定的。正如张一兵在《梦幻哲人阿多诺》中指出的那样,“哲学逻各斯上的碎裂必然要走进美的情境,现实中的孱弱一定会祈求浪漫的圣思来拯救”^[14](P126)。我们看到,和本雅明一样,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特有逻辑决定了辩证法的理论宿命只能走进美学的意境,只能是一种审美救赎论。其实,“否定的辩证法”一开始就没有像马克思哲学那样明确地提出要超越资本主义制度,以谋求全人类的解放为宗旨,也没有像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那样谋求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或资产阶级国家。阿多诺从来就不是一名革命家,革命与解放等理论话语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就没有出现过,从他的哲学中也推导不出任何联合起来进行社会革命的结论。“否定的辩证法”表面上看似激进的和彻底的,但它本质上已经失去了革命实践的成分,因而只能表现为一种审美意义上的救赎。如果说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卢卡奇的立场是唤醒无产阶级的革命意识,那么阿多诺的同一性批判理论则贯穿个体主体救赎的理论旨归。在这里出现的是马克思与阿多诺的又一重大界限或本质性区别。

实际上,只要回避了内在性的实践品格,辩证法就必然会变成纯粹的思辨。而马克思的革命性辩证法绝不把实践作为辩证法的外在点缀和理论应用,它在本质上就是实践辩证法;它不仅明确地把资产阶级作为革命的对象,而且直接诉诸无产阶级通过对资产阶级的革命实践来砸碎整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从而实现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认为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是可鄙的事情。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那些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头上的锁链。而他们获得的却是整个世界。”^[15](P504)然而,我们看到,在“否定的辩证法”的理论视野中,阿多诺既未把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也从未诉诸于任何实践性的革命行动。相反,他认为资产阶级也是同一性的受害者,“否定的辩证法”的使命就是对全部个体主体的思想性救赎。考虑到阿多诺的理论建构发生在马克思和卢卡奇之后,当这种思想性的救赎在阿多诺这里蜕变为通过美学意义上的审美而获得救赎或者蜕变为一种审美革命时,它在理论上甚至是低于近代以来的整个旧的理论哲学水平的。比如,在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中,无产阶级完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他看来,无产阶级是一个没有前途的概念,无产阶级革命同样也会导致集权主义,哪怕这种革命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专政,其最终结果也不过是用一种“同一性”取代另一种“同一性”,并不会带来真正的社会解放。由于无产阶级这个集体主体的缺失,阿多诺只能转向对原子个体主体性的拯救。他试图构建一种强调差异性的思维逻辑来破除同一性对个体主体性的统治,并通过对个体主体的拯救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审美救赎。在阿多诺这里,救赎不是一种方案,它本身就是目的。

阿多诺以貌似非常革命的绝对否定的逻辑来颠覆资本主义社会,但解放途径的虚无化直接导致了社会批判理论的乌托邦性质。它完全不能再现资本主义的发展史,也不能从根本上揭示造成资本主义整体性弊端的根源,因而,“否定的辩证法”只能把资本主义社会理解为一部悲剧史而不是创造史,只能求助于审美意义上的思想救赎,把美学领域中的审美救赎作为抵制资本主义同一性的最后阵地。

(三) 精神奴役对劳动剥削的遮蔽

在马克思生活的自由资本主义时代,面对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和社会财富的极大涌流,马克思一方面高度肯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历史必然性及其进步性,另一方面却对作为财富创造者的工人阶级劳动条件和生活状况的日益恶化以及财富分配的两极分化持有深刻的同情和不满,揭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工人贫困之间的内在性关联,破解资本家剥夺工人劳动的秘密,是马克思对自由资本主义发起的时代之问,探寻实现工人解放和财富公正分配的现实道路,是马克思毕生为之奋斗的理论使命。正是面对这样的时代课题,马克思的革命辩证法决定性地步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场域,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劳动的秘密。

当资本主义发展到阿多诺所处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工人阶级的劳动条件和整体赤贫现象已经有了较大改善。随着中产阶级日益壮大,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日益趋向较为稳定的金字塔型社会结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呈现出新的态势并日趋缓解,因而大规模的工人运动日趋低迷。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整体意识形态及其对社会成员的全面控制已经形成,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总体上似乎焕发出新的生机。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话语体系是否有效,资本主义为何没有像马克思和列宁预言的那样走向崩溃,是自卢卡奇开启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一直在反思的时代课题,也是阿多诺的时代之问。如果说卢卡奇试图通过恢复马克思辩证法的黑格尔哲学传统以重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那么阿多诺则是致力于对黑格尔理性辩证法的批判,把对时代之问的破解引向纯粹的精神领域。在阿多诺看来,资本主义的生命力根源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精神统治,而精神统治的实质就是以黑格尔理性哲学为代表的同一性思维。正是作为理性启蒙辩证法之极端后果的同一性思维以及由同一性思维延展出来的资本主义工具理性统治和奴役着人们的生活世界和精神世界。工具理性把一切商品交换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全部社会关系都转换成可计算和可量化的关系,它不可遏制地全面渗透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成为一种牢不可破的网,进而侵蚀和奴役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在文化领域中,工具理性的侵入使大众文化成为一种文化工业或工业文化,在这种意识形态中,“生产方式已经被标准化,个人只有与普遍性完全达成一致,他才能得到容忍,才是没有问题的”^[5](P140)。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文化已经被工具理性同一化了,个体主体只有接受和承认这种同一性的文化才是被社会认可和接纳的,以至于整个社会中的原子个体被这种资本主义文化的同一性迷惑且毫无察觉,从而陷入一种新的精神奴役。在阿多诺看来,在这样的境况下,卢卡奇式的从外部对无产阶级灌输革命思想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唯一可行的途径就是展开对资本主义精神奴役的揭露与批判,哲学的任务就是要解构这种同一性思维及由这种同一性思维派生出的社会现实。正是由于这种定位,注定了阿多诺与马克思理论关注点的区别和不同,阿多诺的“否定的辩证法”无论如何都不会通向马克思关于劳动剥削和政治解放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革命话语体系。他聚焦于资本主义同一性思维对个体主体的精神奴役,看不到各个历史时期社会意识形态的统治形式及其控制程度尽管有所区别,但总是有其产生的特定的深层经济根源,不懂得意识形态的解放归根到底依赖于生产关系的改变、剥削性的社会关系消亡以及阶级对立的瓦解。因此,尽管资本主义的统治形式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和自我调整出现了许多新变化,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以及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史观原则却并不因此失去理论效力,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规律也不会因此动摇。对资本主义的本质性超越归根到底依靠的不是思维方式的抽象批判,而是实践意义上的对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革命。

三、作为思想整体的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总体性质

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是一个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思想整体。当我们从理论贡献和思想局限的不同视角对它做出评价时,我们切不可忘记它的整体性。分析方法或知性思维的优势在于可以从不同方面呈现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特质,但它作为一个思想整体的总体性质却并不是诸如此类的不同

特质的总和。我们完全可以就它的不同特质谈出更多的方面,但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总体性质却并不会由此呈现出来。当我们习惯从“一方面”和“另一方面”做出思想评价时,这里出现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辩证思维,而是卢卡奇援引黑格尔的著名见解曾指称的作为知性思维的“折中主义”^[16](P48),而这种“折中主义”不过是辩证法思想的“装饰品”^[16](P51)。因此,必须超越理论贡献和思想局限的碎片化分析,从总体上思考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总体性质。

对阿多诺“否定辩证法”总体性质的审视需要我们把它的理论贡献和思想局限置于阿多诺的思想总问题中,在他面对的时代课题以及对解决该课题的总体性思考中准确定位理论贡献和思想局限之间的内在关联。在这里我们将会看到,阿多诺“否定辩证法”的思想局限也许并不只是消极的和仅仅应当给予严厉批评的,它在更大程度上反倒是积极的和有意义的,或者说恰恰可能是最富有启发性的东西。消极的东西若具有积极的启发性意义,从本质上来说应根源于特定的时代内涵和时代诉求,即根源于垄断资本主义与自由资本主义的时代性差异。面对垄断资本主义时代资本统治、阶级关系和无产阶级被奴役状况的新变化,无产阶级之阶级意识的再启蒙已经成为新的紧迫性时代课题,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都把这一时代性课题作为理论的根本任务。就此而言,如果说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存在着特有的思想局限,那么这种局限性显然并不只是“否定辩证法”的局限性,它在更大程度上是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或者说,“否定辩证法”的局限性并不是阿多诺的某些观点的局限性,而是他破解新的时代课题的总体性思路的局限性。然而,由于新的时代课题本身的合理性,它在总体性思路上的局限性也因此具有了积极的意义,毋宁说是一种积极的局限性。由此,对阿多诺“否定辩证法”总体性质的判断就与它的马克思主义性质有了直接性关联,即阿多诺究竟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及他在何种意义上是或者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一) 阿多诺是否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对阿多诺是否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总体性质的判断,必须依据他的思想总问题以及破解总问题的总体思路的合理性,而不是以他的个别观点和个别行为为根据。当某些学者指证阿多诺为非马克思主义者时,常常犯了这样的错误,比如他们把阿多诺对待学生造反运动的反对态度作为他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论据。阿多诺对20世纪60年代在欧洲爆发的左派学生造反运动的确持否定态度,他甚至曾经在法庭上当面指证自己的研究生。为此,左派女学生当众裸露上身以示对阿多诺的嘲笑与讥讽。针对学生造反运动,阿多诺曾经指出,“当我建立自己的理论模型时,万没想到人们会用燃烧瓶去实现它”^[14](P32)。据此,有学者认为阿多诺在政治实践上采取冬眠战略,是政治寂静主义者,因而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判定一个理论家或思想家是否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绝不能如此简单粗暴,仅依据阿多诺在现实政治斗争中看似言行不一的做法就认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恰当的。对阿多诺是否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判断,必须进入他身处其中的历史情景,面对的复杂现实性及其对时代课题的审视和反思去理解。如果置身当时的历史场景就会发现,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我们很难判断阿多诺对学生造反运动所采取的保守策略到底是对的还是错的。阿多诺不相信学生们用燃烧弹造反这种方式可以实现对资本主义的颠覆和否定,也不认为学生运动是推翻资本主义的有效途径。在他看来,这不过是一种伪实践,这种伪实践不考虑应该做什么、怎么去做以及有没有效果等问题。这种激进行动主义的目标不仅是无法实现的,反而会引起更多的反革命,其实质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行动主义。在现实性的立场上,阿多诺对左派学生造反运动的如上判断不是没有道理的,因此,仅从阿多诺在政治实践上的保守立场就判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或许过于简单化了。阿多诺放弃革命实践的行为也许只能说明,面对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新变化,他不再接受马克思的暴力革命论。在他看来,唯有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大众层面日益突出的“精神异化”,并在哲学深层展开对资本主义同一性所强制的“精神奴役”批判才是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才能从思想上确立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意识,并使全社会的原子个体主体从同一性的精神奴役中解放出来,这才是对抗资本主义的唯一现实的出路。为此,阿多诺试图用绝对否定的逻

辑来解构资本主义的同一性思维,以避免奥斯维辛集中营式的极端野蛮的现代性灾难的重演。西方马克思主义肇始于卢卡奇,经过柯尔施、葛兰西发展到鼎盛时期的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是这个学派的第一代学术领袖。他植根时代变化探索革命的路径和策略,试图重新解释、补充或重构马克思主义,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或现代化。因此,尽管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在对革命形势、革命主体、革命道路和革命策略的判断上与经典马克思主义有区别甚至背离之处,但据此认为阿多诺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许是不能成立的。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亘古不变的教条和判定一切思想性质的标准,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这个意义上,把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看作是一种新马克思主义或许更为妥当。

(二) 阿多诺是否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终结者

如果我们把阿多诺看作一个新马克思主义者,那他在新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中又处于何种理论地位,具有何种理论性质呢?对此,国内著名学者张一兵先生提出,“在本世纪60年代末,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理论思潮在其历史存在的必然性上已经终结。这种终结在理论逻辑层面上是以阿多诺对总体性和统一性的批判为质性标识”^[17]。张一兵认为,由于阿多诺开启了拒绝启蒙理性和全部工业文明以及在辩证法上采取绝对否定逻辑的全新思路,这种理论上的突变导致传统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上被终结了,从而开启一种新的理论形态,即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这一指认包含了极其深刻的理论见解和学术洞识,但同时也带给我们一种疑问:如果把阿多诺的理论突变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终结节点,那么阿多诺和他之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没有内在关联,阿多诺之后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又是否完全沿着阿多诺的理论突变继续向前发展,阿多诺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思潮与阿多诺之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否分道扬镳了?我们认为,在看到阿多诺相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理论突变的同时,还应注意它们二者之间的承接问题。首先,由卢卡奇开创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特征就是乌托邦倾向,阿多诺的“星丛”理论结局也走向了一种乌托邦救赎,它并未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理论特质发生彻底性的断裂。其次,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卢卡奇也表达了一种对现代工业文明的拒斥态度,甚至由此开启西方马克思主义现代性批判之先河。可以说,经过了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新危机的积极探索和批判,才有之后阿多诺激进的“否定辩证法”批判理论。阿多诺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思潮,由于受后现代主义的影响,的确迎来了一个以后现代为特色和标志的理论时代,但在同期的美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在理论范式和思维方式上明显没有受到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实质性影响,相反却出现了抵制这种思潮的趋向。此外,海德格尔对科学技术的深刻批判、阿伦特对极权主义的深度挹伐以及政治哲学史家施特劳斯对现代性的全面检视,都是这个时代向工业文明和启蒙理性提出挑战的例证。所以,在阿多诺之前和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是可以找到可以合并的同类项、关联点或相似处的,它们之间是不能以“否定辩证法”为界标进行绝对区隔的。

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逻辑仍然在延伸,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逻辑上是没有终结的。我们并不否认阿多诺的批判理论和“否定辩证法”的确引发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转向甚至背离,但这种变化似乎并没有上升到终结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固有逻辑的高度,它更多的还是一种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内部的逻辑变奏。与其说阿多诺终结了西方马克思主义,也许更应当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和社会矛盾的新变化来理解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前后所发生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转向。

参考文献

- [1]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
- [2] 张继武.我和法兰克福学派——J.哈贝马斯同西德《美学和交往》杂志编辑的谈话.世界哲学,1984,(1).
- [3] 阿多尔诺.否定辩证法.王凤才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9.
- [4] 张一兵.无调式的辩证想象: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的文本学解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 [5] 霍克海默,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片段.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 [6] Theodor W. Adorno. *The Culture Industry*. London and New York: The Taylor & Francis e-Library, 2005.

- [7] 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外国哲学研究室. 法兰克福学派论著选辑: 上卷.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8.
- [8] F. 费迪耶等. 晚期海德格尔的三天讨论班纪要. 丁耘译. 哲学译丛, 2001, (3).
- [9] 卡尔·波普尔. 猜想与反驳——科学知识的增长. 傅季重、纪树立、周昌忠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 [10]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1] 城塚登. 青年马克思的思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 尚晶晶、李成鼎等译. 北京: 求实出版社, 1988.
- [12] 郑伟. 经验与星丛: 阿多诺“否定的辩证法”研究.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 [13] 海德格尔选集: 上卷. 孙周兴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1996.
- [14] 张一兵. 梦幻哲人阿多诺.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01, (1).
-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4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 [16]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 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 [17] 张一兵. 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 理论逻辑和现实嬗变——西方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思潮和晚期马克思主义.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0, (4).

A General Survey of the Theoretical Nature Of Adorno's "Negative Dialectics"

Bu Xiangji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Zhu Libing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Abstract There are two completely different approaches in the examination of the theoretical nature of Adorno's "Negative Dialectics" based on Marx's dialectics. The viewpoint of intellectual reflection insists 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externality and fragmentation and is committed to exploring the similarities and contradictions between Marx's dialectics and Adorno's negative dialectics so as to present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s and limitations of Adorno's negative dialectics. However, the overall nature of Adorno's dialectics in this approach has disappeared. In order to properly treat the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he limitation and its internal connection of negation dialectics, we have to examine Adorno's negative dialectics from the overall point of view of dialectics, put ourselves in the new situation that Adorno faces in the monopoly capitalist society, and consider the resulting general problems of his theory. Only then can Adorno's negative dialectics be regarded as a complete theoretical totality and present its overall nature accordingly. We will also discover the limitations of Adorno's negative dialectics as commonly understood, and this is precisely where its ideological innovation lies.

Key words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aesthetic salvation;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revolutionary dialectic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收稿日期 2021-05-12

■ 作者简介 卜祥记, 哲学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研究院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 200240;
朱利兵, 上海财经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上海 200433。

■ 责任编辑 涂文迁